



大学校长与

中国近代大学

本土化研究

吴立保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大学校长与
中国近代大学
本土化研究

吴立保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校长与中国近代大学本土化研究/吴立保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004-8758-6

I. ①大… II. ①吴… III. ①高等学校—教育史—研究—
中国—近代 IV. ①G649.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0617 号

责任编辑 刘志兵
责任校对 韩天伟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3.5

插 页 2

字 数 337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西邦一千年，中土三十载”，中国近代大学用三十多年时间走过西方大学近千年的道路，这种比喻是说明中国传统高等教育转型成近代大学时期的重要性。高等教育和教育史领域的众多学者对此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也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较多采用现代化研究范式，即用现代化理论来阐释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认为是后发外生型发展的类型特征，是通过借鉴西方大学的发展模式走向现代化的，移植西方大学模式是中国近代大学发展的基本路径。也有的研究认为，中国有悠久的高等教育思想和传统，有着独特的高等教育哲学，有着支撑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发展的大学之道，这些内容也是中国近代大学发展的重要资源，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近代大学的形成与发展并非完全模仿与移植西方大学，其中也蕴含着本土因子。吴立保的博士论文，采用本土化的范式研究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历程，探寻中国近代大学发展中具有主体性的本土因素，并选择从对中国近代大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校长的视角开展研究，研究思路新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一定的理论价值。

作者通过大量的文献综述和理性辨析，从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剖析本土化的内涵，克服传统的二元

对立观，以连续性认知模式为基点，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视为一个连续的发展体，本土化的存在是与全球化的存在紧密相连的。这样，在本体论上将本土化视作一种客观的存在和事物自我演进与发展的状态，本土化可以理解为在本地原有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吸收新鲜养分及自我调整以完成文化的自身进化的过程，是一种“内部取向”的自我演进，使本土性、民族性与时代发展同步。在方法论上，本土化是通过借鉴与吸收的方式使外来因素和本土因素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融合，实现事物发展的现代性转换，是全球视野与本土情怀的结合。本土化具有消减、转化、厘清，乃至超越纯粹移植模仿“他者”的偏误，它可以从主体性的身份来理性辨别外来因素的影响，实现本土与外来的对话与沟通，在消解外来文化强势话语权的同时，实现自身的重构和发展。作者认为，中国近代大学的本土化，是指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通过移植、借鉴、吸收外国大学制度和大学精神，立足于对本国高等教育传统的批判与继承并融合西方大学发展经验所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大学发展过程。

作者将中国近代大学按照办学性质和办学经费来源两个维度分成四种类型，每一类型选取一所典型大学作案例研究，以个案研究法先后研究了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张伯苓与南开大学、梅贻琦与清华大学、陈垣与辅仁大学等不同的本土化模式。在个案研究过程中，以大学内部发展取向为重点，从大学内部管理制度、教学以及师生生活等方面的变革入手，剖析大学校长在办学实践中所采取的本土化措施，归结每所大学发展所体现出的特有的精神气质，并从本土化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上两个方面概括每所大学的特征，在本体论上，概括出北京大学的“蓄道”、南开大学的“持道”、清华大学的“卫道”和辅

仁大学的“归道”的本土化特征。最后，总结了中国近代大学本土化的五点理性认识，体现了作者的独到见解，它对我国现代大学本土化和国际性之间的关系的处理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和学术参考价值。

近代大学的发展是我国大学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阶段，其历史意义可以从多角度来解读，我们欢迎和祝贺吴立保博士论文的出版，就是因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研究视角。当然大学校长对其发展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与此同时，那时的大学也是造就著名大学校长的舞台，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待吴立保博士今后深入挖掘第一手的资料，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期待有新的研究成果。在全球化发展日益加速的今天，全球与本土之间的张力构成时代发展的主题，如果本书的出版能引起更多的读者、学者的关注，并深入探索如何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对我国大学发展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

谢安邦

2009年8月29日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1)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13)
第三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33)
第四节 研究视角的确定与研究方法的选择	(40)
第二章 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本土化	(46)
第一节 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界定	(47)
第二节 中国近代大学制度产生与发展的社会 动因	(54)
第三节 师法日本：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创立	(56)
第四节 日欧融合：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调适	(70)
第五节 借鉴美国：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转向	(78)
第六节 借鉴与融合：大学校长与中国近代大学 制度的本土化建构	(85)
第三章 中国近代大学精神的本土化	(100)
第一节 大学精神的界定	(101)
第二节 西方大学精神源流	(108)
第三节 中国传统大学精神的演进	(124)
第四节 中国近代大学精神的解读	(136)

2 大学校长与中国近代大学本土化研究

第五节 继承与吸纳：大学校长与中国近代 大学精神的本土化选择	(143)
---	-------

第四章 兼容并包：蔡元培与国立北京大学的

本土化模式	(156)
第一节 蔡元培之前的北京大学本土化发展	(157)
第二节 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的本土化发展	(168)
第三节 北大精神的形成与发展	(209)
第四节 蓄道：北京大学的本土化特征	(215)

第五章 本土生长：张伯苓与私立南开大学的

本土化模式	(221)
第一节 南开大学的创办	(222)
第二节 张伯苓时期南开大学的本土化发展	(225)
第三节 南开精神的形成与发展	(262)
第四节 持道：南开大学的本土化特征	(268)

第六章 移植创新：梅贻琦与国立清华大学的

本土化模式	(276)
第一节 梅贻琦之前清华大学的本土化历程	(277)
第二节 梅贻琦时期清华大学的本土化发展	(282)
第三节 清华精神的形成与发展	(309)
第四节 卫道：清华大学的本土化特征	(321)

第七章 移植改造：陈垣与私立辅仁大学的

本土化模式	(326)
第一节 辅仁大学的创办	(327)

第二节	陈垣时期辅仁大学的本土化发展	(335)
第三节	辅仁大学的办学特色	(361)
第四节	归道：辅仁大学的本土化特征	(368)
第八章	结语：中国近代大学本土化的历史经验	(375)
第一节	士志于道：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应 与大学精神相耦合	(376)
第二节	制度建设：大学本土化发展的基点	(380)
第三节	精神建构：大学本土化发展的核心	(385)
第四节	文化自觉：大学本土化发展的文化 使命	(389)
第五节	和而不同：大学本土化发展的全球 视野	(395)
参考文献		(401)
后记		(422)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一 问题的提出

在遥远的古代，处于彼此隔绝、互不往来的人群孤立状态决定了人类文明的特殊性与差异性。人类延续发展到现在，是一个漫长的历史与文化的变迁过程。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对话在文化的实践发展中至关重要，“很可能及时导向两种相互沟通的传统的一方或两方的信奉者们对他们自己迄今为止已经确立的规范与标准作出一种内在的批判，以便使一方或双方将对方的理智与实践的文化规范方面和文化评价方面采纳到自己的理智和实践的文化规范和评价之中”^①。由此推动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进步，但无论如何，各种古代文明间的差异也是相当大的。我们感到，各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特殊性^②。雅斯贝尔斯认为，在公元前 8 世纪至公元前 2 世纪的这一广阔时间区段

^① [美] 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万俊人等译，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年版，序言。

^② [德] 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译，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0 页。

2 大学校长与中国近代大学本土化研究

里，不少各自独立发展的人类文化共同体先后经历了从原初文明向确立了稳固的基本精神方向的成熟转进的过程，从而形成了“轴心文明”，东西方两极分化的人类精神基础在西方、印度和中国这三个彼此独立的地区产生了^①。“轴心文明”开启了各文明后来的发展方向，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模式。轴心文明大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在逐渐展示其完整的理论内涵空间，充分体现出理论成就的同时亦将自身的困限暴露无遗。尽管如此，各轴心文明在今天并未彻底消亡，而是各自不同程度地保持了对于当代社会与人生的影响力。轴心时代孕育形成了人类反思与超越的力量，由此成为直至近代一直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② 人类文明的发展并没有完全消除原初文化的特质，即使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一切的今天，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仍然存在，将会出现一个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发展的新景观。新儒家学者杜维明提出了“新轴心时代”概念，他认为世界的人们正处在一个新轴心时代。新轴心时代的特点是各种不同的文化聚合在一起，此类“聚合的文化”成了新时代的“天下之公器”，为世界所共有。两千多年前“轴心时代”的精神传统在交流、沟通、激荡中相互吸收而充分成熟，但这也只是文化的“聚合”，而非文化的“同一”，不同文化传统

① [德] 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译，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1 页。

② 同上书，第 55 页。

基因的存在仍然是新轴心时代文化创新的根源，也就意味着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不可能掩饰文化的本土特性，多样性和同样性的并存，是新时期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特征。现代世界无论有多新，总是扎根于过去，过去是我们赖以生长的土壤。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扎根于本民族的土壤之中，由此逐渐形成本土文化所特有的内涵和质的规定性，形成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区别的文化特点与发展脉络。“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生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土生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像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身份、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①露丝·本尼迪克也认为，“每一文化之内，总有一些特别的，没有必要为其他类型社会分享的目的”^②。因此，每一种民族文化对于所属民族来说都具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和不可替代性。15世纪以后的世界，人类文明随着地理大发现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全球正在变成一个唯一的“地方”，科技的进步把世界上一个个真实的地方联结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网络，这种“时空压缩”所造成的虚幻，使人似乎真的无法感觉到历史时空的存在，无法触摸历史脉搏的律动，于是福山发出了“历史终结”的感叹！“行为活动的世界性扩散、洲际关系的扩张、社会生活全球范围的组织，以及共有的全球意识的增长”^③，这是对全球

① [德]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册，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0页。

② [美] 露丝·本尼迪克：《文化模式》，何锡章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③ [美] 乔治·里茨尔：《虚无的全球化》，王云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化最为经典的描述，全球化浪潮带来了文化的交融与互通，但有时也在比照互动中彰显了文化的差异性质，引发更多不同民族国家强烈的文化怀乡情结。

从各种迹象显示，我们已迈进一个新的轴心时代。西化和现代化理论所预设的以启蒙精神为主的欧美文明被奉为人类进步和发展的典范已受到质疑，取而代之的绝非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所期望的“冷战”后美国一枝独秀的景象，也未必即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所显示的地缘政治。因为福山和亨廷顿都未摆脱西方（特别是美国）霸权的窠臼。杜维明先生认为：“在新轴心时代之中，现代化可以拥有不同的文化形式，因为，轴心时代的精神传统包括西方之外的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道家和儒家，所孕育的认同意识会与日俱增。只有通过对话才能为全球社群开辟一条和平共存、同舟共济的康庄大道。”^①

21 世纪，人类生活在日益世界化、一体化的社会之中，同时，在精神层面上又有日益追求归乡与故园的趋向。“无论我们自己多么现代化，无论我们的世界多么全球化，我们都不能不记住我们自己来自何处。只要我们记住了自我认同的文化根源所在，就不会忘记我们的历史，不会漠视我们各自的异质性和差异性。差异并不排除同一，异质并不意味着丰富多彩，意味着个性创造和自由竞争，意味着真正健全的人类现代化和全球化有着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② 因此，人类文明的发展需要我们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保持应有的张力。我们必须仔细思考的新课题是：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正激烈加深根源意识并

① [美] 杜维明：《新轴心时代文明对话及儒学的精神资源》，吴光主编《中华文化研究集刊·当代新儒学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8 页。

② 万俊人：《全球化心态中“现代心态”与“文化乡愁”》，《科学中国人》2002 年第 1 期。

导致本土化的积极回应。种种根源意识，浓郁的“原初联邦”，如族群、性别、语言、地域、阶级、年龄和信仰，不仅在第三世界引起伤身的“政治认同”，在高度工业化的现代国家也发挥了巨大的影响^①。全球多样性文化的共存与繁荣，离不开本土文化的发展。正如先进的民族文化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本土文化一样，新的先进的世界文化不可能是某一种纯而又纯的民族文化，而只能是多种文化的融合互补。著名的人类学家弗郎兹·博厄斯在《种族的纯洁》一文中指出：“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越多样化，互相学习的机会也就越多。”^② E. 萨义德认为：“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持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③ 在他者与自我的转换中才能激发创新的动力。由此可见，本土化不是全球化的对立面，而是一个与全球化相伴生的概念，两者相互依存，全球化发展进入高潮时，也是本土化诉求愈发激烈之时，因此，本土化是本土意识的不断觉醒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一个事实上正在发生着的过程，同时也是在特定条件下思考问题的一种方式。

大学从起源来看，是全球化的产物，它与政治、经济和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在“稀疏全球化”（戴维·赫尔德语）时代，大学由国际化，走向民族国家化，在“密集全球化”时代，再次走向全球化。在保留传统大学基本精神的前提下，现

① [美] 杜维明：《新轴心时代文明对话及儒学的精神资源》，吴光主编《中华文化研究集刊·当代新儒学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②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③ [美] E.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26页。

代大学与传统大学大相径庭，呈现出纷繁多姿的形态，所有这一切都是大学在国际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传统的大学精神融入本土文化诉求不断创新的结果。如德国的大学在继承中世纪大学教学功能的同时，将科研融入大学之中，形成德国大学的模式。而美国的大学在移植德国模式的同时，融入美国人的服务意识，从而形成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美国大学模式。这些模式既是全球化，也是本土化发展的结果。如今，大学已从中世纪后期寂寞的“象牙之塔”，演变为五光十色的“城市”，大学由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的全球化趋势比其他任何社会机构都越来越彻底，大学理念、大学职能的每一次突破都能够很快地在全球传播。这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发展无疑产生了促进作用，但同时我们也会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离它们自己的传统越来越远，当新的大学理念源源不断地输入，在知识精英的大力鼓吹下获得强势话语的时候，外来话语体系取得合法性的后果之一是引起传统与现代的断裂，第三世界的大学对西方大学的依附性也就随之加强，就出现了阿特巴赫所指称的学术知识生产的“世界体系”，边缘和中心泾渭分明，第三世界大学成为知识的消费者而沦入全球化的陷阱之中。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不得不思考大学的民族性和本土性的问题。就中国大学来说，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过百年，也可以说是西方大学在中国的移植，但诚如张君勱所言：“曾不思世之可以移植者制度而已条文而已名词而已，其不可移植者为民族心理。”^①他清楚地指出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不是模仿，而是创造与适应。因而从一开

^① 张君勱：《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始,中国大学就具有本土化情怀和使命,通过自身的本土化实现救亡图存的社会目的。涂又光先生用一种更加生动和更加深刻的表达方式提出了这一命题:中国所办的大学应该办成“在”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 in China),还是中国“底”大学(a university of China)^①?“中国的”大学,从性质上说,首先应该是在文化、思想和学术上独立自主的大学,而不是西方大学的附庸藩篱或学舌之鹦鹉;其次应该是坚守并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大学——这是中国的大学区别于他国大学的本质特征。从功能上说,中国的大学应该是能够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提供教育支撑的大学。如今面对全球化的浪潮,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在中国的大学”变为“中国式的大学”,套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式的大学”何以可能?

二 研究的意义

(一) 以史为镜:中国近代大学本土化成就的现实意义

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近代大学的产生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因此,相对于西方近代大学的内源性发展而言,“移植性”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首要特性^②。但是,正如英国教育家阿什比所说:“大学保存、传播和丰富了人类的文化,它像动物和植物一样地向前进化。所以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③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查尔斯·艾略特也说:“一所

① 涂又光:《文明本土化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1998年第6期。

② 方增泉:《近代中国大学(1898—1937)与社会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1页。

③ 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滕大春、滕大生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名副其实的大学，必须是发源于本土的种子，而不能在枝繁叶茂、发育成熟之际，从英格兰或德国移植而来……美国的大学在成立之初就决不是外国体制的翻版。”^① 移植于西方的近代大学要与近代中国的国情相适应，要经历一个与本国、本民族文化相互接触、交融而实现本土化的过程。这一过程首先是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上半世纪。从教育制度的发展逻辑来看，中国高等教育制度是通过学习外国先进的制度和经验，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的教育体系。在此过程中，在清末是通过移植日本模式来实现的。中华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制度实现了两个重要的转变：一是从日本模式到美国模式的转变，二是从以引进外国教育制度为主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建立有自己特点的教育制度的转变。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近代大学越来越走向民族化的大趋势下，中国的近代大学也很快从起初更多的“移植性”迅速地向“本土化”方向发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东南大学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大学的产生与发展，包括辅仁大学等教会大学在内，至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通过本土化努力，近代中国大学制度基本形成，多元化的近代大学体系基本建立。至抗日战争期间，以西南联大为典型代表，大学的发展形成弘扬了中华民族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文化精神选择，透过西南联大，可以看到中国大学人对大学精神的坚持与坚守。如果说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大学发展的“黄金期”的话，西南联大所体现出的民族精神则是一座巍巍的丰碑。

近代中国大学既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产物，也是文化传播的载体。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近代中国大学产生和发

^① 刘玉良编：《大学的精神》，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4 年版，第 357 页。